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的生平及其著作*

〔日〕高杉一郎著 胡有恒译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4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的一个佃农的家庭^①。父亲查理兹和母亲莎拉生了三个姑娘和两个儿子，史沫特莱是第二个女儿。

史沫特莱对自己的祖先，在这本书中这样写道：“我母系亲属都是劳动者，都是一些性格温和而且信仰很强的人。父系亲属则是一些叛逆者、流浪者，好说大话、喜欢歌唱的人。”史沫特莱本身即兼有这两种家庭的特点，经常发生两种性格的矛盾，但无论从那方面说，似乎还是比较偏重于父系的性格。

当史沫特莱还很小的时候，他们一家移居到科罗拉多州南部。“于是，洛克菲勒煤矿和炼铁厂，除了空气之外，似乎所有的一切都归他们所有了。”父亲在这里干不习惯的劳动，并经常酗酒，母亲给

* 本文是日本文学家高杉一郎为他译的艾格妮丝·史沫特莱的主要著作《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的日译本所写的代序。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一位伟大的美国人”的史沫特莱，献出她大半生参加中国革命，留下了很多珍贵文献，有待进一步翻译研究。今发表此译文，供研究者参考。作者高杉一郎(1908—)，日本小说家、文学研究家，著译还有《西伯利亚俘虏记》、《甘地传》、《莱梦湖畔》等——编者

人家洗衣裳做饭,过着时饥时饱的生活。史沫特莱一直到十五岁,就处在这样荒凉的环境和贫困的生活之中,因而养成了一个连男子都比不上的性格倔强的姑娘。

史沫特莱一家的五个孩子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本人所受的教育也是随机所得没有系统的教育。她在过了20岁的时候才知道有莎士比亚,开始读莎士比亚是在40岁以后。

当她16岁的时候,她母亲因为过度劳累和营养失调而死去。从此,在史沫特莱弱小的双肩,担负了扶持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还有死去的姐姐的一个婴儿的重任。回忆当时的情况,她这样写道:“假如我是象母亲而不象父亲,那么说不定就把这个重任作为不可推委的责任而承担了。但是我对母亲的辛苦的一生感到愤懑,因此拒绝了走她的道路……,一般男人们喜欢上哪去就上哪去,干什么都随便,也可以发现新世界,然而女人却只能跟随着男人,或是只能在家里生儿育女,这样的命运我拒绝了。为了妹妹和小外甥只做了必要的两三件事情,一当把弟弟等人交给了父亲,我就开始了近于流浪的生活,之后也一直继续过着这种生活。”

由于伯母的好意帮助,史沫特莱学习了速记。但是她也干过勤杂、卖书、摘烟叶等工作。她曾在亚利桑那州师范学校作为特别生上了一年学。

当她18岁时由初恋而结婚,她的丈夫是一个年轻的技师,结婚不久,两人又离婚了,但以后他们却成了终生的好朋友。史沫特莱当时这样写道:“我永远厌恶把性视为男女之间结合的主要因素的想法,只有建立在友情的关系上才是真正的人生。”

史沫特莱在她的一生中,也没能摆脱关于性和婚姻问题的歪曲观念。她在憧憬培育女子优美成长的爱情,与憎恨作为奴隶的妻和母这二者之间,分化了自己,感到万分痛苦。她在一本书中这样说过:“性意味着暴力,卖淫,结婚意味着生孩子,哭哭闹闹缠住

不放的女人，男人牢骚满腹。……”又写道：“对于妇女来说，所谓结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起一个经济投资的作用，否则也就是成为一个奴隶制度的遗物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20岁的史沫特莱离开西南部去了纽约。在此居住的四年间，白天工作，夜间在纽约大学学习。她素来就有强烈的正义感，当她受到了亚洲的“受压迫者”那样命运的刺激时，她对印度问题特别关心，为了帮助印度的独立运动，她伸出了友谊之手。在1918年她24岁的时候，由于被诬以“帮助德国间谍活动，危害了美国的中立”的罪名，将她逮捕入狱。因为她拿不出一万美元的保释金，而被监禁了三个月，在这其间她写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狱中之友》（“Cell Mates”），这实际是她的处女作。和平恢复时她就被释放了。

1919年末，史沫特莱在航行于波兰与美国的货轮上当勤杂工，从而到了欧洲。但她没有明确的目的，在欧洲住了一阵子之后，她又访问了苏联，并想可能的话就去印度。

她一下货轮立即直奔柏林，在那会见了一个组织印度流亡政府的革命家——威伦德那拉那特·切特巴迦亚，这个杰出的人物把她吸引住了，二人“不合法”地结了婚，所谓“不合法”的结婚是因为威伦在法律上已经和一个做过天主教修女的爱尔兰少女结过婚，这是史沫特莱第二次的恋爱与结婚。

他们彼此都很尊敬，互相恩爱，婚后生活继续了几年，尽管是这样，史沫特莱并未感到幸福，是因为亚洲大家庭制度培育出来的人与一个资本主义美国生活方式培育起来的人气味不能相投呢，或是由于流亡的革命家太贫穷，史沫特莱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她不得不接受精神分析疗法将近三年之久。

健康恢复之后，史沫特莱在德国纳粹党运动开始高涨的柏林大学教英语，同时开始进行为取得学位的研究工作。但由于她基

础欠佳，又不得不打消攻取学位的念头。

1927年33岁的时候，史沫特莱为了从威伦那儿完全解脱出来，走向新的生活道路，去丹麦和捷克旅行，在那里写了小说《大地的女儿》（“Daughter of Earth”）。此书在1929年出版，一般人认为这是史沫特莱的处女作。

这本小说，描写了在威斯康星州荒凉的农场里，一个酒鬼的父亲和由于过度劳累而疲惫不堪的母亲，以及与她的一个个相继出生的弟弟妹妹一同在幼年时代所渡过的玛丽·罗杰斯的那种生活情况。当时某评论家对这本小说曾这样写道：“这个故事不能看做是小说，因为它太严酷，太强烈，简直是过于真实了，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的话，谁也不会写得如此动人。”因此我们读了《大地的女儿》，就会感到这本书的女主人就是史沫特莱自己，这个女主人公渡过幼年时代的农场不是威斯康星州而是作者的故乡密苏里州。

总之，史沫特莱的许多著作，当做文学作品阅读是缺乏想象力的，文体也过于平铺直叙。然而，将此视为她的半自传，作为对亚洲受压迫的中华民族的苦难悲痛及他们斗争胜利喜讯的报导时，她的作品立即洋溢着爽朗简洁的气势，显出生机勃勃的朴素之美，使读者受到感动，给人以生活的勇气。《大地的女儿》，做为史沫特莱的半自传，在今天已被译成德、俄、波、捷、意、荷、瑞典、丹麦、西班牙、中、日等国文字，她能给世界妇女以勇气，就是这种原因。（中文版为林宜生译，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创立者，后被中国反动派杀害的杨铨的序文。日文版是史沫特莱和杨铨的朋友而且与杨铨遭到同样命运的和尾崎秀实所翻译，由改造社出版。）

从在欧洲和印度的流亡革命家在一起生活的1920年开始，一直到1927年写成《大地的女儿》一书期间，在中国发生了暴风雨般的革命。到北伐高潮的时候，中国革命由于1927年蒋介石的反共武装政变而断送。

关心亚洲“受压迫者”的印度革命的史沫特莱，很自然地同样对中国革命也极为关心。从1925年—1926年，她开始研究中国的历史，史沫特莱的丈夫威廉也是反帝同盟的创建者之一，在布鲁塞尔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史沫特莱与出席大会的印度代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第一次会面，并热心地谈论了中国的革命。

1928年，史沫特莱和具有历史悠久的德国自由主义日报《法兰克福日报》签订合同，作为该报派往中国的特派员，从此她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活，时年34岁。

1928年末，史沫特莱到了原为张学良统治的东北地方，由哈尔滨开始经过沈阳、大连、北平、上海、广东，渐渐地南下。中国在“中世纪”封建主义机构的统治下，在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下，几乎如同没有防御的奴隶那样，没有人权、没有教育、没有财富、连维持每天最低生活的粮食都没有，中国人民的痛苦情景给史沫特莱留下强烈的印象。她把这些印象写在1933年出版的《中国的命运》（“Chinese Destinies”）一书中。这书的德文版的书名为《血染的中国》（“China Blutet”）。这部书的内容写得可能更是直率。

在那绝望的黑暗的“中世纪”的中国社会中，“红星”放出的光芒，使史沫特莱通过亲身的体验，渐渐地靠近了它。她与经受欧洲近代教育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交朋友，又和鲁迅、茅盾、丁玲等作家，救国七君子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交朋友，最后和中国红军的毛泽东、朱德直接建立了关系。

为了拯救“中世纪”的“血染的中国”，她对了解中国红军特别感兴趣。无论从她的出生或精神方面，她纯粹是一个美国人，杰斐逊派的自由主义者。当她在美国帮助印度流亡革命家活动的时候，她和创立不久的美国共产党党员们也结交了许多朋友，但是她没有参加共产党。

那时的心情，后来她这样写道：“共产党在纽约成立了，但是我

没有参加。我认识他们很多的领导人，他们写的书、论文我也读过。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共产党员的言论有同感，听取了他们的言论以后，在中国，我对共产党员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但是我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放弃我在自己的精神上和生活方面细小的疑问，而去完全信赖领导者。我并非自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但是，我并没有白白地成为认为自己才是掌握真理的唯一钥匙的人们的工具。

为此，我受到了来自双方的攻击。信仰资本主义的一些人们，把我所作所为，说成是共产主义者、赤色分子，或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则认为我是个人主义者、理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有的美国女共产主义者，还给我贴上‘史沫特莱主义’的招牌而在私下高兴着。”

这些宣传非常有趣。也就是说，她和中国红军的结合，并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媒介，而是由于亲身的体验和目睹的感受，是她的祖先为美国革命而斗争的民族信念和行动所焕发出来的动机。当她由波兰进入苏联，看到守卫在国境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卫兵时，或者在中国的西北，看到在极度困苦中，保持着崇高的道德和纪律的中国红军战士时，她就常常想起为自由而战的美国的祖先们的业绩。

象这样的经历，不仅仅是史沫特莱一个人，还可以从一再声称“我决非共产主义者”的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早在1937年就写了《中国的红星》，对被称为“共匪”的中国红军表明了积极的强力支持；父母世代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曾是美国海军将校的埃万斯·卡尔逊，他从“伦理的观点”对中国的红军也表示积极地善意地支持这些情况中，同样都可以看到。

在为数不少的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日本知识分子中，几乎找不到对近在毗邻的中国所发生的共产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能够正确

理解和支持的新闻记者,相反地,在宣称为个人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中却出现了不少远渡太平洋到中国西北访问,并公开支持正在进行的社会革命的新闻记者,这样的事实我认为有很大意义。

史沫特莱 1933 年在苏联的疗养院里休养,并写了 1927—1931 年中国红军的组织与发展以及与国民党残酷的围剿做斗争的情况,以故事的形式写了一本书,这就是 1934 年出版的《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 Red Army Marches”),后又改名为《红水流遍中国》(“Red Flood over China”)。这本书的德文版书名为《中国在战斗》(“China Kämpft”),与以前的《血染的中国》正是一个巧妙的对照。

1937 年 7 月日军开始侵略中国,8 月 13 日战火扩展到上海,8 月 14 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日自卫宣言,8 月 22 日公布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停止了长期的内战,终于成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 8 月创建了以朱德为总司令的八路军,过了两个月,在十月里又编成了新四军。新四军在红军的主力长征北上后,为了掩护撤退而留在南方,统一了进行游击战的部队。

从抗日战争开始后一个月左右,史沫特莱由所居住的延安到前线去寻找朱德的司令部,在山西五台山附近追到了朱德,从此就随着八路军行动。日军沿京汉线由北平到太原,由太原往潼关,象怒涛似的奔腾前进。八路军在一面迎击,一面逐渐由山西向南撤退的同时,绕到敌后用游击战术骚扰敌人。史沫特莱有时被担架抬着,有时步行,有时骑马,转战各地,绝对不和八路军离开。在这几个月战尘途中,可以说是史沫特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她是这样记述的:“只有和这样褴褛的军队一同生活,才能满意地感受到象过去在密苏里森林或科罗拉多煤矿那样的民主主义。”史沫特莱关于中国的第三部著作,即 1938 年出版的《中国在反攻》(“China Fights Back”)便是写这个时期的经历。

1938年末，中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评论》曾以附册单行本发表过史沫特莱的《八路军从军记》。当时虽由于战时新闻检查的任意删改，加上时间紧迫，以及在翻译上也粗制滥造，但作为生动的报导前线实况的报告文学，我们还是贪婪地阅读了。

那时，在山西战线铁道部队的上田广发表了战争文学《黄尘》而出了名，史沫特莱的《八路军从军记》恰好是《黄尘》中所写的相反的内容，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曾用红铅笔在山西省地图上一面寻找那些地方，一面对这两个作品进行了比较。《八路军从军记》是摘自现在成为我们话题的《中国在反攻》。

美国的某批评家，在此书出版后不久，写有以下书评：“如果想要了解中国战争的实际状况，想要知道那里并不是炮声隆隆的大规模战争，而只是在僻静的山谷中用小部队去骚扰日军的供给线，象要攻击而又撤退，以及向村民宣传为新中国的美好未来这样一种战争情况的话，那么就请看一下这本书吧。这些就是由长征到成为近代军事奇迹的八路军的历史。”

不久，史沫特莱在朱德的命令下，不得已而由战火愈益激烈的前线转到当时抗战中国的首都汉口，在中国红十字军医部工作。以后由汉口而长沙，由长沙而敌后，由敌后而重庆，由重庆又去游击区，东奔西走，为了挽救败退的中国，连中国的一些爱国分子都没能做到象她那样热情的献身活动。

1941年12月末，史沫特莱回到了久别的美国。在战火纷飞中，风尘仆仆地奔波于中国大后方各地，她原来就很纤弱的身体由于疟疾和多种的疾病而被折磨倒了。为了进行治疗，她告别了她不忍离开的中国，但是，从此她竟再也没能踏上中国的土地。

回到美国的史沫特莱通过给报纸杂志投稿、讲演、广播等多种形式，一直向美国人民说明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立场。同时她以她从1919年末搭通往波兰的货轮离开美国，一直到1941

年末回到美国的 22 年的全部经历为中心写成了精心之作，这就是《中国的战歌》（“Battle Hymn of China”）。

《中国的战歌》在 1943 年 11 月一出版，便成为优良图书推选委员会入选的精佳作品，它和《大地的女儿》都被称为史沫特莱的主要著作。

她在这本书里，由回忆父母、自己的幼年时候开始写起，到学生时代和在欧洲八年生活之后，便渐及主题的中国，这是本书的序幕，以后便开始描述中国解放战争的伟大全貌，即在这本书中，有她个人的和历史的两个主题，这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叙述的作品。

这种结构非常重要。也就是历史的亚洲战争所形成的残酷的现实画面，对她来说并非距离太远，她总是把这个现实与本人的经历紧密联系起来去体验、认识。这就是她的思想——一般地说，也就是美国优秀的知识分子的根本想法及生活方式。日本知识阶层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战火中大多昙花一现，有的竟成了叛徒，相反，史沫特莱虽非共产主义者，却能对中国红军的斗争给予那样热情的支持，想是由于她的人生观和生活方式主使的缘故吧。

她写的内容从此书的书名已充分表达出来。书名“Battle Hymn of China”是出自“Battle Hymn of Republic”，从第四章末尾的文章中可明显地看出来。当她听到为民族解放战争而战斗的中国人民的歌声时，史沫特莱的胸中自然会想起她的祖先们，在美国奴隶解放战争时热烈歌唱的“共和国的歌声”吧。在她的意识中，是把时间和地点不同的两个战争，汇为同一的历史潮流。——“上帝、我们如果要为了神圣而死去的话，那么我们将为解放而死”。

尽管是从她个人观点去描述的，但这本书仍可以说是概括的、全面的、叙事诗般的著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认为史沫特莱并非单以旁观者通讯员的身份肤浅地观察历史的表面，而是对如同台

风涡动中心那样的历史发展的焦点，以满腔热情的献身精神去探求的结果。我看过一些有关描写战前战后中国历史的书，包括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书，而象这本眼界如此宽阔的书，在它处还未见过，我认为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以亚洲历史为主题的《战争与和平》。

1944年秋，中国的抗日战线陷入分裂的危机。蒋介石为了攫取胜利的成果，尽量减少牺牲，想把战后的政治实权确实掌握在手，把开赴前线装备齐全的政府军调头包围中国红军。美国史迪威将军要求蒋介石把政府军开往前线，把美国援助的一部份装备送给红军，但是蒋介石反而要求美国召回史迪威将军，而美国竟然答应了他的要求。

史沫特莱通过发表论文和广播，警告中国的统一战线将有分裂的危险，继续要求蒋介石解除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封锁。那一年冬天，史沫特莱曾向朋友们说过，想要写些以中国为主题的戏剧和革命文学，她是否实现了呢？从战争终于由民主主义取得胜利而结束的1945年的夏天开始，史沫特莱便写作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The Great Road”）。

史沫特莱最初会见朱德是在1938年一月，由西安到中国红军根据地延安的时候。那时朱德51岁，史沫特莱43岁。我们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他们初次见面时栩栩如生的描述。她这样一个对人类善恶有着强烈感情的女子，好象从一见到朱德就很相契，以后两人一直是特别要好的朋友。

史沫特莱在与朱德会见的当晚，也会见了毛泽东。然而她对毛泽东的最初印象并非如此。当然，随着日月的变迁，她对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发自内心的尊敬。

她很快下定决心写朱德的生平，她每天晚上在黄土窑洞里倾听朱德回忆他前半生的事迹，并作下笔记。记录是从幼年时代开始，当她记录到中国红军起步长征的1934年时，正当1937年7月

7日发生了芦沟桥事变。朱德去往前线，史沫特莱把未完成的“朱德的生涯”保存起来。她在这时，访问了毛泽东，并和他商谈。

“在延安完成朱德传记，还是到前线去写战争纪事，哪个重要呢？”

毛泽东回答说：“这一次的战争比过去的历史更为重要。”

史沫特莱听从了毛泽东的忠告，把朱德传记的笔记搁置起来，为追随现实的朱德而奔赴前线。由于这种原因，写朱德传的工作不得不延迟到恢复和平的八年后去了。

在美国重新开始写朱德传时，又遭受到许多的障碍。美国1947年起的对中国的政策有了彻底的转变，对于同情新中国和反对蒋介石的言论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压抑。

1949年晚秋，史沫特莱带着没有完成的《伟大的道路》，离开苦闷的美国迁往英国。以后就在那里继续写那本传记，她计划写完这本书后再去中国。

然而，她终于未能看到把她半生献给了中国的新生姿态，1950年5月8日由于胃溃疡手术而在伦敦长眠了，时年五十六岁。

4月28日在她入院前曾写过：“万一我死去，我希望给我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并希望把自己的遗骨埋葬在中国”，不料这话竟成了她的讖语。

遵照史沫特莱的遗嘱，把她的遗骨安葬在北京西郊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她的墓碑上，是由朱德写的碑文：“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之墓”，下面刻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立”。

她一直到最后一口气的时刻，还惦念着倾注了她心血的《伟大的道路》，最初无论在美国和英国都没有接受出版这本书的出版社，直到1955年才由东京的岩波书店出版。它的英文版是在第二

年 1956 年由《每月评论新闻》出版的，并附有豪伯曼和斯维吉写的序言。^②

我开始知道有史沫特莱这个人，是从改造社出版的《一个女人去大地》才知道的。以后我又在阅读发表在美国的《民族》和《新群众报》上的一些她的采访报导，其中有写以鲁迅为首的中国知识阶层的苦难道路的报告文学《在黑暗中》和《毛泽东会见记》，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 1937 年的时候，仍在《民族》杂志上发表了《马》的短篇，并译成了日文。

史沫特莱除了对于专门有关远东的一些文献外，特别喜欢读《坎特伯雷故事》的作者杰弗里·乔叟与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作品。

关于饮食，她什么都喜欢吃，特别喜欢喝咖啡，她在中国感到最苦的是喝不到咖啡。她象老百姓的女儿那样，喜欢在田间劳动，只要有空就耕地、或者饲养家禽。

以上关于史沫特莱的晚年，是在她去美国的时候向出版者作的回答。从她那好似从高处突然落下急骤变化的一生，仅窥其片面，也会感到很有意义。

注

- ① 关于史沫特莱的生年和出生地有各种不同说法。在 H·W·威尔逊公司的传记辞典《廿世纪作家》中，说她是 1890 年出生于俄克拉何马州。在史沫特莱晚年，曾是她的密友的石垣绫子女士在 1956 年 9 月号的《新女苑》中写的史沫特莱的生年为 1893 年。岩波书店出版史沫特莱的《伟大的道路》一书中，阿部知二写的是生年不明，出生地为俄克拉何马州。H·W·威尔逊公司的传记年鉴《现时传记作家》，无论是 1944 年版和 1950 年版写着史沫特莱的生年均均为 1894 年，出生地为密苏里州。这个传记最详细，并询问过史沫特莱本人，又经过她亲自过目，因此采用了这本书的说法。——作者原注

译者按：据美国研究史沫特莱的专家史蒂夫·麦金农近年的调查研究，确认史沫特莱于 1892 年 2 月 23 日诞生在美国密苏里州奥斯古德镇。

② 中文译本《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1979 年由三联书店出版。

(周丰一校)

北京图书馆藏

史沫特莱著作中译本

国共合作后怎样发展统一战线

宋景桐译 汉口出版社 1937.12.

打回老家去

导报丛书编辑部 1938.10.

在游击队中

吴哲非编译 上海言行出版社 1939.4.

前线消息

哲民编译 上海言行出版社 1940.9.

中国的战歌——序曲篇

丘融译 展望出版社 1946.5.

随军漫记

田璞译 上海出版社 1946.9.

大地的女儿

陶春杰译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

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梅念译 北京三联书店 1979.